



成都话方位词词缀“-头/-面”的语言变异研究

李艾倪

NACCL_30, OSU

10/03/2018



上海交通大學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1 文献综述： 成都 & 成都话

2 研究问题

3 研究方法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5 结语



1

文献综述：成都 & 成都话



地理成都



成都市位于四川省中部，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



地理成都



历史上，成都市的行政辖区经历了几次调整形成了现阶段11区5市(县级市)4县的行政格局，不同于解放前成都最早的三大主要城区（东城区，西城区和金牛区）。



注：

11区5市(县级市)4县: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简阳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郫都区、大邑县、蒲江县、新津县。

地理成都



语言成都



成都话之语言特点

成都话作为四川话中的代表性方言属于四川话中的湖广一枝（且志宇 2015:3）。主要分布于成都市中心城区及青白江、金堂等成都东部地区。本文主要着眼于成都话老城区（一环以内）标准音。

成都话作为北方方言中西南官话的典型代表本身具有十分独特的语音语法特点：

成都话共有21个辅音声母（包括零声母），36个韵母（何婉，饶冬梅 2014）。

语言成都



语音语调

- 同大部分北方方言的语音系统一样，具有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分阴阳，有阴平和阳平等基本特点（袁家骅 1983: 23），但同时成都话又没有“zh” / “ch” / “sh” / “r”等翘舌音声母，但却有韵母“ae”等等。

句法

- 成都话具备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复合句型结构，如“V起来”（例如：你跑起来做啥子？意为：你跑来干什么？）等。

构词

- 成都话显著表现为名词重叠式，如“抽抽”（抽屉），“坝坝”（空地）等，同时成都话中也存在一些特有的词缀如“-儿”（猫儿，兔儿），“-子”（今年子，儿娃子）等

语言成都



成都话之前人研究

针对成都话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系统研究（张清源 1984，梁德曼1987）始于八十年代后期（崔荣昌1994）。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成都方言语法研究》（2001）是迄今为止关于成都话方言语法研究最系统的专著。

关于成都话词语的研究系统可见于：罗韵希1987；杨武能1995；梁德曼、黄尚军1998；黄尚军2006；张文君 2009；

语言成都



成都话之前人研究

有关成都话**词语**的研究还包括

名词重叠式（冷玉龙1987）；

动词重叠式（杨玲2005）；

复合趋向结构（张清源1998）；

成都话特有形容词（杨绍林1993；邓英树2002）；

量词（张一舟2000）；

数词（张一舟2000）；

助词（张一舟2001）；

副词（张一舟2001）；

语气词（周家筠1983；张清源1997；鲜丽霞 2002；赵媛媛2006）
等。

语言成都



成都话之前人研究

现阶段针对**成都话语音**尤其是声调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早在五六十年代《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和《四川方言音系》就系统记录了成都话的语音情况。

近年来也不乏一些有关成都话声调问题的描述性研究（肖娅曼1999；周及徐2001）。

以新的理论范式如优选论以及语音实验手段来探讨成都话变调问题的研究亦层出不穷（吴翔宇2010；闫小斌2016；张一舟、杨骞2010；秦祖宣2015；辜磊等2015；何婉2015）。

语言成都



成都话之前人研究

关于**成都话句法**特征的研究相对比较缺乏。

少数针对成都话句法方面的研究也多是立足于与普通话的差异展开，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关于成都话疑问范畴研究（谢光跃2012）和成都话中“AP/VP + 很了”等特殊句式（杨梅2003）的理论研究。



前人研究不足：

系统本体特征的理论研究+成都话语音词汇变化的趋势预测和特点考察。

绝大多数研究采用的语料均来自于本地报纸、文学作品和基于田野调查的观察记录，研究方法和目的也主要还是以搜集、描写分析和比较为主，相对比较传统和保守。

但是传统的方言研究以语言本体为对象缺乏对语言社会性的考量，也就无法进一步了解同一言语社区下的语言变异特征与变化趋势。语言的社会属性在传统的方言研究体系下显然也就无法得到突显。

2

研究问题



上海交通大學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头”/“-面”博弈



吕叔湘撰写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将“-头”作为词缀的语法特点总结如下（1981: 473-474）：

- 1) “-头”作为构词后缀附着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性成分后面构成名词，表示名词化后的语法意义：如名词加“-头”（石头，舌头），动词加“-头”（看头，说头）和形容词加“-头”（甜头，苦头）等。
- 2) “-头”作为方位词词缀：方位词词根如上、下、里、外、前、后等增加词缀“-头”后仍表示方位常做地点或时间状语；同时普通名词或处所名词直接加后缀“-头”也可以表示地点范围，如“心头，脑壳头”分别表示“心里和脑子里”之义，而“医院头，学校头”则分别意为“医院里”和“学校里”。这类词的构成中词缀“-头”实为“里头”的缩略形式。

成都话中的“-头”&“-面”



在表示上、下、里、外等基本方位或具体地理位置时，成都话习惯于在名词性表达地点范围的语素后加上“-头”这一词缀，如城头（城里头）即意为“城里面”，明显不同于普通话中多以词缀“面”结尾的方位表达。

如普通话中的“里面”相对应的成都话表达为“里头”和“后头”，而普通话的“外面”则对应成都话中的“外头”。同理，普通话的“上面”常在成都话中表达为“高头”或“上头”（1964 《汉语方言词汇》）。



研究问题

从语言内部因素来看：

- 1) 当名词在受地点范围这一语义限制条件下，单音节名词词根和双音节名词词根是否会对方位词词缀“-头”和“-面”的使用产生影响；
- 2) 同理，句子间的连接词及语用提示语的性质是否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方位词如“后头或后面”在表达时间先后顺序这一语义性质方面的选择；
- 3) 语言接触的影响下语体的正式程度是否会影响被试对方位词词缀“-头”和“-面”的选择；



研究问题

从社会因素来看：

- 1) 作为方位词词缀，“-头”和“-面”的使用是否会受到诸如年龄、性别、受教育情况以及语言认同程度的影响并呈现出异质但却有序分布：哪一种社会变量又主导着方位词构词方式的选择；
- 2) 同时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成都话在普通话的影响下，方位词词缀“-头”的使用频率与“-面”的使用频率是否已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

3

研究方法



上海交通大學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社会语言学变项规则分析法

语言变异特指某一语言形式 (Variable) 在不同语境中用不同的表现形式 (Variant) 来表达同一语言功能或意义 (徐大明等 2004) 。

变项规则分析法 (Variable Rule Analysis) (Labov 1966) 是社会语言学中广泛用来处理自然语料中语言变异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

其主要理论原则为“多因素原则”，即不同语言形式的交替出现受制于多种语言内部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同时作用与影响。其操作原理在于采用一种最大似然估计 (量) 的统计模型，从而使它可以接受不均匀分布的变量参数来作为输入数据，甚至允许一定范围的缺值运算。最后生成的结果是一系列概率参数，以表示某种变体产生的各种概率性条件，因而特别适合于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 (徐大明 1999; 郭熙 2013) 。

语料采集

笔者通过“朋友的朋友” (Milroy 1980) 的方式联系到40名成都市本地居民参与了本次社会语言学调查。

40名参与者绝大部分实际均来自三大老城区之一的金牛区，一小部分来自于新都区 and 青羊区。

成都市人口构成的现实情况 + 其极高的流动程度所导致的本地人口比重严重失衡的情况 + 可行性的考虑 →
笔者在选择联系被试时将标准主要确定为从小在成都市区内生活长大且无长期出川经历。

语料采集

根据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中常用的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Labov 1966) , 笔者按照性别、年龄及受教育水平等传统的社会因素将参与者具体划分如下表:

	女性			男性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高
15-20	0	6	0	0	5	0	0
20-30	0	1	6	1	1	2	2
大于 35	5	2	1	7	3	1	0
总数		21			19		

语料采集

(一) 社会语言学自由访谈 (Labov 1972b)

参与者全程均被要求使用成都话。

每位参与者参与访谈的时间至少为45分钟。

所有访谈采用的问题均以每位参与者的兴趣为主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问题的形式除了穿插其中的关于参与者基本信息的询问，其余问题均为话题性和开放性问题）：

如“你觉得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您平时会做噩梦吗”？

“有没有遇到过十分紧急和危险的状况”等等。

语料采集

(一) 社会语言学自由访谈 (Labov 1972)

——“观察者悖论”(Labov 1972)

录音的采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灵活调整：

- 1) 如果参与者为笔者熟悉的朋友，采访过程由笔者本人单独完成；
- 2) 如果两名参与者互为朋友，则由两人同时参加访谈，并以自由聊天的形式展开，笔者则只在适当时机提供话题并以旁听和观察为主；
- 3) 如果参与者为笔者朋友的朋友或家人，则由朋友代替笔者作为采访者进行录音。

最后总共收集整理到约40个小时左右的自然语料。

语料采集

(二) 看图说话

描述图片所涉房间中物品摆放的具体方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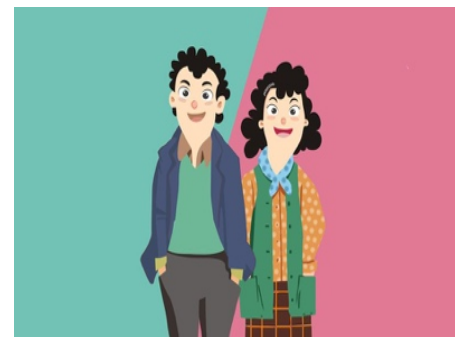
设计目的：集中考察参与者在进行方位描述时使用方位词构词方式的异同。





语料采集

(三) 一问一答



问题形式为“A在哪里”?

干扰图，即其位置描述无需使用“头 / 面”作为方位词构词方式。

语料采集

(四) 语言态度调查

录音结束后 / 总共30题 / 关于成都话语言态度 / 在线问卷调查
为了防止问卷内容对参与者访谈过程造成干扰，因此，所有录音结束后参与者才被要求填写问卷（Michol & James 2010）。

问卷的题目除了基本姓名与祖籍信息需要手动填写以外，其余题目均以选择题的方式呈现，以节省被试的时间并保证问卷的质量。

问卷的具体内容主要针对参与者现阶段社区归属的紧密程度和参与者对成都话的偏好程度设计。为了避免出现问卷信息不符的情况，问卷中一些关键问题会在访谈中提及，以确保数据的前后一致性。

语料分析

- 所有录音前10分钟和最后10分钟未计入转写范围
- 1) 不带词缀“-头 / -面”的句子，如“她在屋里”；
- 2) 重复问题中出现的方位词带“-头/-面”的表述；
- 3) 出现“-头 / -面”以外的方位词词缀如“-方 / -边”，如“狗在桌子的下方 / 下边”。
- 对在表述所在句子中连续出现两次同样方位词缀的情况，笔者只计算为一次实例（token）。

语料分析

- **语言内部因素**包括形态因素与非形态因素：

形态因素主要包括词根的音节情况：

词根为双音节地点名词（a）；词根为单音节方位名词（上下里外前后）（b）；词根为三音节名词（c）以及词根为单音节地点名词（d）。

语料分析

非形态因素：语法功能和语体正式程度两种。

语法功能：单音节方位名词加“头”表示时间状语（t）和地点状语（h）的情况。

语体正式程度：社会语言学访谈标记为（Z）；看图说话标记为（K）；和问答式为（W）。



语料分析

■ 社会因素：

性别：女性F 男性M

年龄差异：20岁以下n； 20-30岁q； 和35岁以上m

受教育程度：低C； 中G； 高D

语言态度（归附动机）：j(强); e(弱)

语料分析

编码举例具体如下：

- (1) “我妈没有工作了，她就是在屋头给我煮饭啊那些嘛”
(01/ /F/Z/ 01) （自由访谈）。
- (2) “桌子上面是乌龟” (01/F/ K/35) （看图说话）。
- (3) “鱼在鱼缸里面” (01/ F/W/ 45) （问答式）。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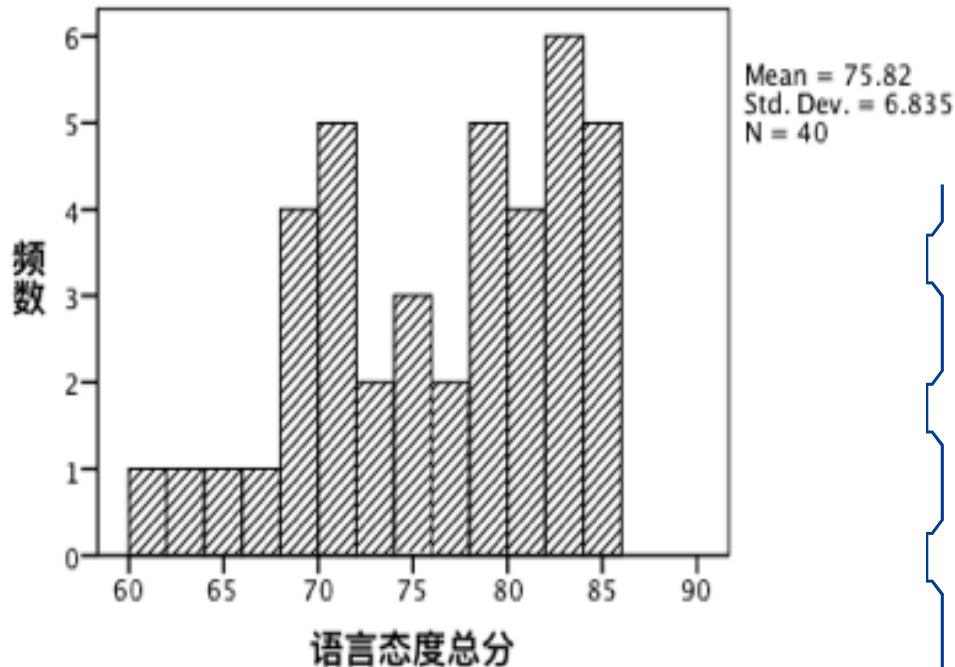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结果1:语言态度



Max: 85

Min: 61

Mean: 75.82

语言态度与“-头”缀使用率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512, Sig.=0.001, $p < 0.05$, 属于中等程度相关。



每一道题目赋值为：1-5分
计算以最终量化参与者对成都话的偏好程度。

如在“是否喜欢成都话”这一问题中，参与者的回答若为“非常喜欢”，该参与者在该题目中记作5分，若为非常不喜欢则记作1分。最终分值即为各道题目得分之和。

问卷中的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对社区的归属感，二是对语言本身的喜爱程度。

结果2: 语言内部因素



影响成都话“-头”缀分布情况的语言内部制约因素的变项规则分析结果

因素组	因素	频数	百分比	作用值
语体正式程度	自由访谈	1079	66.6%	0.636
	看图说话	62	24.3%	0.170
	问答式	54	21.3%	0.122
	变异范围			51
语用功能	时间状语	294	64.2%	—
	地点状语	901	53.9%	—
词根音节数	单音节方位词	249	39.0%	—
	双音节地点名词	73	100%	—
	三音节名词	148	100%	—
	单音节地点名词	2	100%	—

语体正式程度

结果3: 社会因素



影响成都话“-头”缀的社会制约因素的变项规则分析结果

因素组	因素	频数	百分比	作用值
年龄	年轻女性	229	61.9%	0.811
	年轻男性	161	42.8%	0.538
	青年女性	182	42.6%	0.279
	青年男性	79	37.1%	0.221
	中年女性	343	70.6%	0.456
	中年男性	201	77.9%	0.654
	变异范围			
归附动机	强归附	703	74.5%	0.738
	弱归附	492	41.4%	0.306
	变异范围			
教育水平	高等水平	248	54.1%	0.683
	中等水平	555	48.7%	0.385
	低等水平	392	73.5%	0.586
	变异范围			

结果3: 社会因素



年龄 > 归附动机 > 受教育水平

年龄级差 (age grading)

“u” – shaped curve
(Downes:1984:191)

讨论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成都话中作为方位词构成的“-头”缀与“-面”缀旗鼓相当，已经形成博弈态势。

就共时而言，“-头”缀和“-面”缀二者的社会变异也并非此消彼长的简单数量关系，而是呈现出复杂而有规律的有序分布：年龄，语体正式程度，语言态度，受教育程度已然成为影响成都话中“-头”缀分布的主要推动力。

社会因素超过语言内部因素，成为主要的制约力量。而在社会因素中年龄则成为最显著的制约因子，青少年阶段和中年人群均表现出较高的语言本土化，二者的趋同性反映出个体与言语社区的亲密关系在青少年和中老年阶段得到强化，前者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影响，而后者则更多体现为一种“回归”。

5

结语



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本研究通过社会语言学拉波夫范式下变项规则分析法系统考察了语言接触下成都话方位词构词现象的社会分布情况。

研究发现：“-头”缀与“-面”缀已经形成博弈态势。年龄成为影响“-头”缀和“-面”缀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其次，语体，语言态度及其他诸如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被调查者对两种变量的选择与使用。

语言变化常常诞生于语言接触所产生的语言竞争与选择的过程中。正如萨丕尔所言，语言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同文化一样，几乎不会是自给自足的。语言接触作为语言变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交际的多层次需求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为语言的变化与发展提供了契机与可能。



参考文献（节选）

郭熙，2013，《中国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Labov, W.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273–309.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Hoffman, M. F., & Walker, J. A. 2010. Ethnolects and the city: Ethnic orientation and linguistic variation in Toronto English.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22(1), 37–67.

Labov, William (1972b).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吕叔湘，1981，《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

梁德曼、黄尚军，1998，《成都方言词汇》[M]，成都：巴蜀书社。

Milroy, Lesley (1980).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Park Press.

秦祖宣，2015，成都话的连读变调与韵律结构[J]，《汉语学报》，(02):36-44+95-96。

徐大明，1999，联系社会来研究语言——重读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J]，《当代语言学》，(03):51-55。

张一舟、张清源，2001，《成都方言语法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



谢谢😊！

